

瀋陽文史研究

第二輯

1987

沈 阳 文 史 研 究

第 二 辑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继往开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

本刊评论

“继往开来”是一句垂训千古的名言。它言简意赅富有无穷丰厚的哲理。“继往”旨在“开来”；“开来”也必源于“继往”。特别是对祖国传统文化更有其深远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加速四化建设的进程中，有一股异说突起，一时间甚嚣尘上：矛头直向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而以虚无主义否定一切传统。最终在“突破一切传统”的叫嚣下，提倡“全盘西化”。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伟大变革时期的兴起，必然孳生思想界的异端杂糅，理论上的谬误纷扰。翻开近代史，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古今文化与中西文化的是非去从之争，一直是时起时弭。终究邪不压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波巨澜，很快便荡涤了一小股污流浊水。如今更加波澜壮阔了。尽管如此，痛定思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当务之急必须在理论上反复深入地拨乱反正，弄清是非。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竟呼叫什么“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是改革的巨大阻力”；甚而提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糟粕而无精华，早该后继无人”等等，纯属荒谬之至。我国正处于伟大改革时期，无可讳言，要改革势必要触及一些传统。对于反掉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当然义无反顾。否则，我们民族无望振兴，四化建设也就无法进行了。但却不能把一切传统通通反掉，中

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我们祖先世代积累优秀传统文化，就有大量的独特价值，早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古代的四大发明；光耀世界文学宝库的从《诗经》直到《红楼梦》都成为世界各国汉学者们日益广泛地研讨的学问；最近美国一位汉学家经过认真探索，认为《易经》的《序言》与《杂卦》是对中国奴隶社会与奴隶反抗压迫的记录；中国的医药学的应用与发展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中药在治疗疾病保卫人类健康方面日益普遍地被西方采用，日本在占有大量的我国医药学理论与验方之后，现在竟贪天之功要创建“东洋医学”；全世界现在已有60多个国家一千多所大学设立了汉学科，有的还成立了中文系，而且对汉学普及的势头日益勃兴；我国的绘画、书法艺术和工艺美术早已为全世界人民所钟爱；它如建筑、音乐、哲学等等，都具有我国古老文化的独特光辉为全世界所景仰。我国从古至今的科学家、文学家，已有23位的名字被国际组织标立于月球之上；就连我国的浏阳烟花在摩纳哥国际焰火竞赛中荣获“中国第一”之后，法国的《尼斯日报》发表文章赞扬说：“天国似乎想要重新从其自傲的隔离中走出来！”是的，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单是已从“自傲的隔离中走出来”，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光辉形象日益伟岸地屹立东方，面向全世界。此中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使我们中华

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积淀力和溶合力。有了这种伟大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历尽了数不清的痛苦磨难，兵燹天灾而日渐强大，终于争得彻底解放成为社会主义大国。怎么可以想象：如果让我们的民族一旦割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成为一张空白再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什么“新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将何所依存？持这种论调的人，不是痴人呓语，也是数典忘祖。

世界上一些文明发达国家的人民，离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必将走向衰落。当然也就对全人类的文明造成缺损。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中指出：“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就连包含有封建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剔除了其封建性的糟粕之后，对它所包含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应继承。道理很清楚，不如此，想要建立新文化，也必是缘木求鱼。

还有些人全盘否定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极力推崇西方文化的“优美”。在改革的年代，我们确是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改造和丰富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然也需要西方文化有益的东西。毛主席早就提出：“洋为中用”；鲁迅也早就强调“拿来主义”，但他决不同意什么都“拿”和“拿来”乱用。他极力主张：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固有的血脉”，离开了“血脉”就无法生存。这位现代化的主将，一贯反对“西崽相”而号召保持“民族魂”。一位在联邦德国汉堡大学工作的华人关愚谦，在给香港《大公报》撰题为《从西德看中国应否全盘西化》的长篇文章中，首先谈到他在中国旅行中与中国青年谈话后说：“有的青年把西方看做天堂一般”“有的，连西方什么样也不知道，也肯定西方比中国的社会好。”他强烈讽刺了这种糊涂论调。当他列举了很

多极富有说服力的事实说明西方社会的痼疾之后！他说：“我认为中国应走适合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国泰民安，独立自主，人人富裕的道路。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为中国没有搞西方资本主义的条件。”这是一位久居西方的同胞的肺腑之言。既然改革的道路不能全盘西化，为什么偏偏要抛弃传统文化的“固有的血脉”去追求什么西洋文化的“化”呢？

改革不能单靠“西化”，民族文化的心理深层的内涵，同样是永远“化”不掉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百余年至今，仍然有日本文化；华侨世居异邦，一直为外国文化所包围，仍然有华人文化；唐人街里中国人的某些习俗，比本土还保存得完整。

当然，在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进程中，仍然需要对外国文化的引进吸收。但决不是唯洋是好，全盘西化。一切都必须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体，是“拿来”，是借鉴。也要“化”，是使其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益养料。

此外，有些人似乎一提到“中国是文明古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化”便勃然色变。他们似乎硬是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当然，也因为“古”，必然包含了封建的糟粕，其中有些东西或许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合理的，甚至是进步的。但在现在却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而且成为反动。例如：封建意识，忠君思想、愚贞迂节、陈风陋习等等自然不能不论优劣一概继承。相反我们需要继承的是那些构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的成份，那才是文化传统的主体。列宁在和蔡特金谈到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时，提出：“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蔑视真正的美，永远抛弃它，不把它当

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荒谬的。”毛主席就极其精辟地提出了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方针：“古为今用”。

据日本《日经产业新闻》今年2月3日发表题为《从中国的典故中学习经营之道》的文章，列举了日本的一些企业的高级领导人每当处境困难之时，就要求助于“先人的教诲”，（“先人”者无疑是指中国古代的先哲。）静下心来学习中国的典故。于是把《论语》中的“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被一个叫江副浩正的企业家订为《新职员守则》，并且把《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做为他的座右铭。有的企业家学习《孙子兵法》、《老子》等等，甚至作他们的精神支柱。诸如此类，外国人把我国的许多传统文化视为珍宝，探索研究，惟恐不及的事例，实在很多。作为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能擅自抛弃？

自然，对待祖国的传统文化，决不该是唯古皆好的复古主义。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凝聚了祖先智慧的结晶，也充满了阶级剥削压迫的血泪；既是民族的骄傲和自豪，也包含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负担。我们既不沉湎于古老的“圣经贤传”而两眼向后，也决不是对传统文化抱定虚无主义一概否定的态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五千余年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延续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是十亿神州各个民族溶合的结晶。虽然经过先后数千年的变迁、社会动乱，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至今不衰，竟而波及五大洲，光耀全世界。这决不是偶然的机运，而是这种优秀文化传统，经过了全民族、全历史过程的积淀，既形成了具有伟大民族凝聚力

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也因之不断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物质财富。尽管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变了，传统文化也随之在变，在更新。可是，无论怎样变，积淀起来的民族的传统文 化，始终是扎根在民族的、和社会生活的土壤。否则，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永远不会有生命力的。

有五千余年光辉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祖先代代相传，用智慧和勤劳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丰硕的文化遗产，要求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群体的反思，为我们的后代子孙做出榜样，对遗产认真地整理，良好地消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在改革建设的步伐日益加速的现时代，在世界改革潮流汹涌浩荡的今天，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是我国当代全民族刻不容缓的伟大天职。

我们认为，只有“继往”才能“开来”，“继往”决不是复古，而是要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去选择、研究民族的文化。反之，丢掉“继往”只求“开来”，势必割断历史，割断民族传统，必使文化传统的研究工作，南辕北辙。

在“继往”这项艰巨的任务上，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我等深感由于“文革”的破坏，某些后生对待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处于无知的现状，早已积虑在胸。愿意追随全社会有识之士，以有限之余年，相与发挥传帮教之作用；以加强广大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扩大开展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志在把这种“继往开来”真正转化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丰富、突破和升华，最终达到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李维纯 执笔——

目 录

本刊评论：继往开来，弘扬祖国传统文化

·~·	红山文化的走向·····	王 曾	(1—8)
·~·	从沈阳塔湾舍利塔石函铭文看辽代沈州的居民·····	朱子方	(9—14)
·~·	东北工业基地是“伪满”遗留的吗？·····	王维范	(15—26)
·~·	艳粉街的原名应为燕坟屯·····	林下风	(27—28)
·~·	多尔衮与史可法之间的书信往来议·····	张秀材	(29—35)
·~·	从盛京的经济发展看皇太极的政治改革·····	金振古	(36—38)
·~·	满族入关前后的文化发展简介·····	白友寒	(39—41)
·~·	辽代奚王世次考论·····	孟广耀	(42—50)
·~·	东丹国使节访日考·····	冯继钦	(51—52)

·~·	书法研究 书法题材小议·····	梅钟岩	(53)
-----	------------------	-----	-------

·~·	古琴家一凌其阵先生·····	黄禹篇	(54—55)
·~·	吕振羽同志在沈阳·····	王维范	(56—57)
·~·	葛月潭的诗书画印 ·····	高常荣	(58)

·~·	诗词曲中的形象思维举隅·····	张秀材	(59—62)
·~·	闲话杜甫的耒阳空墓·····	张秀材	(63—64)

·~·	海峡两岸 喜获台湾校友来信·····	孙春林	(28)
-----	--------------------	-----	-------

·~·	沈阳诗联轶话·····	侯维翰	(65—68)
·~·	珍宝书画集市—南门脸·····	侯维翰	(69)

·~·	天星赞·····	黄禹篇	(70)
·~·	辽海杂咏·····	黄禹篇	(71—77)
·~·	其他诗词·····		(78—80)

·~·	书刊评介 评介《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	王维范	(81—87)
-----	---------------------------	-----	---------

·~·	帝国主义统治的深化与东三省地区经济·····	王维范译 李维纯校	(88—98)
-----	------------------------	-----------	---------

红山文化的走向

王 曾

辽西的红山文化遗址被发现后,我曾两次到牛河梁去考察,并在《东北经济报》上发表一篇“古国神游”的长篇通讯。现在要着重探索一下红山文化的走向问题。这篇文章的前半部,是就红山文化的遗址遗存来探讨中国上古史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的上古史,不应该说成是神话传说史,因为红山文化的内涵证实了三皇、五帝是历史的真实。中国确有五千年文明史;

二、中国的奴隶制社会以前,不是原始公社社会,而是一个漫长的等级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形态只少存在三千年;

三、红山文化是国家的实体;

四、谈谈红山文明的特点;

后一部分着重探讨红山文化的走向:

一、红山文化的缺环;

二、红山文化走向中原的探讨;

三、商殷文化是红山文化的延续。

一、中国上古史不是神话传说

在探讨红山文化走向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上古史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看法,这是因为红山文化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上古史不是神话传说,并且遵循上古史的记载,可以探明红山文化的走向。

自从秦始皇焚书之后,记载中国上古史的书籍几无残存。后世学者拾得一些口碑,得以窥视中国上古的一些情况纂成史书,无论《尚书》、《吕氏春秋》、《左传》《史

记》等等,对上古事物记载虽不周详,但脉络还算清楚,更可贵的是,它不象世界上一些国家之古史讲得那么荒诞。但是近代史学界也仿效外国的说法,认为中国上古史也是神话传说史,甚至说夏以前都是神话。人所共知,中国上古史是以人记事的,有三皇、五帝之说。但这些人也不是编造的神话。例如:三皇,指的是燧人氏、伏牺氏、神农氏。这是古代历史学家有着朴素的历史唯物观点,把人类社会进程的各个时期用拟人的手法作出科学的表述。燧人氏是代表人类用火的开始,这是人类生活发生巨大转折的时代。伏牺氏,是说明人类进入渔猎牧畜时代。神农氏标志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所以说三皇的记载是对社会发展史更加形象的描写,而且没有装饰荒诞的神话。

至于五帝,《史记》等书都简明地记述了他们的氏系和生平的活动。这些记述都是先民们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秦始皇焚了书简,但口碑是无法烧掉的。因为是口传,难免有些附会和编造,更兼史学家的观点不同,有所褒贬,但人们也会看出其真伪。例如《史记》说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无非是一种溢美之词。说蚩尤兽身人语,其实是说蚩尤族人的图腾是猛兽,也是对战败的民族一种贬词。皇帝、颛顼、帝喾、尧、舜人称五帝,他们生平活动在史书上的记载有许多与红山文化的继承问题有关,这方面将在以后探讨中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它给红山文化的走向提供了有史可考的线索,又从红山文化的走向证明了五帝的存在。从而也证明了,中国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二、中国只少有三千年等级社会制度

中国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所表现的社会形态，大体上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基本的亚细亚的形态”。因为马克思主张：“不同的共同体，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发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的。所以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物，是不同的。”（《资本论》第一卷第423页）

基于马克思这一原理，从红山文化的遗址和遗存中，可以得出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之前，存在着只少是三千年的等级社会制度，而不象社会发展史所描述的那样，奴隶社会以前是原始公社的社会形态。这里所说的“等级社会”它不同于奴隶社会，因为在三千年间被剥削者没有丧失人身自由；但它又不同于原始公社，因为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等级是森严的。为此只能称之为“等级社会”制度。

这种等级社会制度，从7000年前的半坡文化遗址，新乐文化遗址以及5600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中都有所体现。为什么说有三千年之久呢？是从7000年前半坡文化，算至夏

朝（夏朝距今约4000年）为止。至于半坡文化以前因为没有地下证据，无法推算出其具体年限，但推想可知还要一段相当漫长的历史。这种等级社会在夏以后还有很深的痕迹。

距今7000年前半坡文化遗址中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女孩墓葬，一种是木棺，一种是瓮棺。说明有权势阶层的女孩死了可以用木棺，而平民阶层的女孩死了只能葬之瓮。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牛河梁积石冢，所表现的等级差别则更为明显。积石冢的中心墓，是用石头砌的墓坑，而墓周围方型墓基是用大石块砌筑的，在中心墓的旁边，还砌有类似现在大花坛一般的祭坛，显示出墓主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附近的六个山头还有规模小一点的积石冢，好象众星捧月一般，臣属于中心墓。真是等级分明，证明了那个时代存在十分明显的等级差别。而通常认为5600年前中国古代是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公社，可是牛河梁积石冢现象，切实地说明，这时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那种美丽的天堂。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会有这类“等级社会”？又为什么既不同于原始公社，又不同于奴隶社会呢？这就象上述马克思的看法一样。中国古代，当人们从渔猎时代走过来的

红山文化简介

一九三二年，日本考古者鸟居龙藏藏在赤峰红山后挖出红泥黑彩陶器，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典型出土文物。五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梁思永、裴文中等曾先后来此考察过。根据文物在哪里首先出土便以哪里的地名命名的惯

例，便定名为红山文化。其遗址遗存遍及辽西的朝阳、喀左、阜新、建平等地，邻近地区的赤峰，敖汉旗、翁牛特旗、围场等地（见地图）也都曾先后发现红山文化的遗址遗存。

一九七九年六月在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一座祭坛，一九八三年十月在凌源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山岗上发现积石冢、女神庙和四万平方米的城堡墙基，经碳14测定

和树轮校正，确认是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的遗址，红山文化的发掘至此形成一个高峰，到现在尚未挖掘完毕。这里把牛河梁遗址画成平面示意图（见另图），以略示其形状规模。

积石冢。这是红山文化时代的古人墓葬。用石头砌成很浅的长方槽墓，尸骨放进后，每具尸身胸前放一块玉饰，然后用石头封盖，最后再培上土。冢中祭祀用品

时候,便进入了农业生产。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初期可能是原始公社形态。但农业生产可以使人们定居下来,又可获得储备产品,并且具有再生产的条件。于是以血统为单位的家族发展为种姓的氏族村社,进而发展为氏族部落,由于以血统家族为生产单位,他们所开垦的土地都是公有,以至发展到氏族部落时,土地仍然是公有制,甚至进入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初期,土地依然是国有制。这种生产方式,就形成了家长、族长、部落首长的上层人物。他们开始是管理者,逐渐形成统治者和统治阶层。他们握有神权、政权、经济权以及国家机器所必备的一切权力。但是这种统治阶层人数是比较少的,而被统治者则是全体劳动者。马克思称这种现象为“一体之父”。这种“一体之父”统治全体平民的现象,直到后来形成国家体系时,仍然保留着。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一国之君,诸侯以及国家机关的官吏都是统一制度下的统治阶层,实际也是等级的划分。这种现象概括为:王有、侯用、奴隶劳动。

中国上古的等级社会之所以延续三千多年以上,一是农业生产本身带来的保守、封闭的生产方式;一是只有等级划分,而没有

很多,都是陶制品。顺着石墙一侧,排着无底的筒形器,不知是什么用场。积石冢有主墓有侧墓,有圆形祭坛。

女神庙。是半穴式庙宇。出土有女神塑像的残块和一些建筑构件残块,是泥抹的,屋顶和支柱尚不知道是什么格局。

石砌城堡。此遗址有四万平方米之大,四周墙基是石砌的。因尚未挖掘,内涵

不明。疑是一个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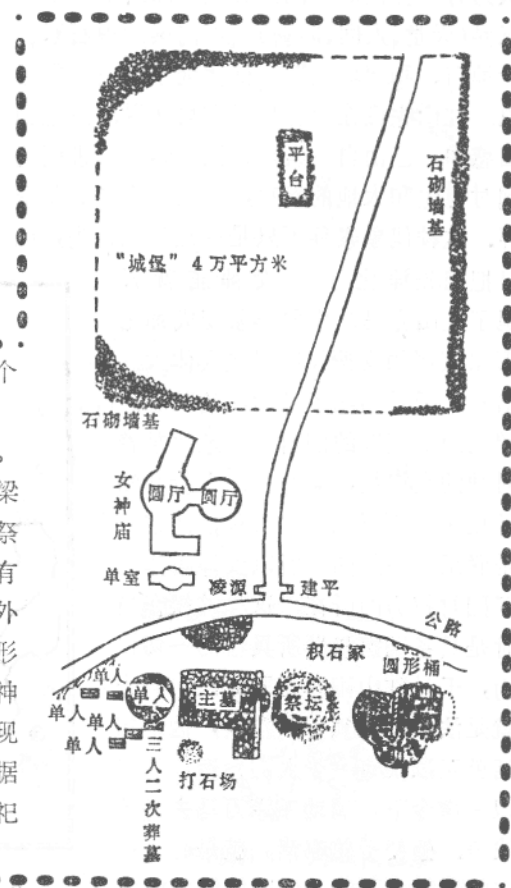
喀左的祭坛。地理位置与牛河梁遗址遥相呼应。祭坛有圆形的,还有方形的。祭坛墙外都排列着无底筒形器。出土有生育神等。在这里还发现有猪骨、鹿骨。据分析是公共祭祀场所。

形成阶级对抗。农民把公共剩余物交给“一体之父”去管理视为当然,而“一体之父”占有剩余产品,开始也是满足的,虽然“一体之父”的贪欲逐渐膨胀,以各种借口进行掠夺,但也必须保持再生产的能力;甚至有一体“之父”为了维护其既得权益和统治权,还要装出是一个仁慈的领袖的形象。所以社会的演进是缓慢的,变革是温和的,社会阶级结构是简单的、隐晦的,于是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一种特殊结构“等级社会”。它与希腊、罗马的社会变革不同,希腊、罗马是在彻底改变原始公社旧制度之后而建立的奴隶社会新制度。

由于上古社会结构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只作上述简要的说明。

三、红山文化是国家实体

了解上述上古等级社会的状态以后,



我们从红山文化遗址和遗存中所表现气魄来看,当时它已是等社会制度下的一种国家实体。

从牛河梁积石冢现象,已说明,在红山文化地区已有国君之类的统治者。这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南至燕山,北至医巫闾山,西起老哈河流域,东沿大凌河一带,在这广大的国土上只少有六个大部落融和成一个红山王国”

(姑且用这个称呼),这里民族在《史记》上称为荤粥(音熏育)族,与风沙(肃慎)、山戎、貉貉、匈奴等同属一个民族部类)而这个红山王国所体现的等级制度要比以前激烈得多,与中国的奴隶制特殊形态有类似之处,不过它没有奴隶制时代那样残酷无情。

人类社会发展到氏族部落的时期,几乎共同地认为万物有灵魂和灵魂不灭;又一致认为有三种性能不同的灵魂,即所谓上中下三界(天堂、人间、阴曹)。牛河梁的积石冢、女神庙、和“城堡”,就体现了这三界之说。红山先民在解释生活和自然界的猜想和困惑中,已由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进而达到对祖先和大地的崇拜,并且形成了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不只是单纯纪念祖先,而且把祖先神化了。女神庙就表现了红山先民从生象形象变成神化形象(例如女神像比现在人体大三倍),于是出现了神的统治观念。

“红山王国”的国君当然地执掌着对神的祭祀权,即神权。人所共知神权一向是与政权(包括财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女神庙体现了国君权力的所在。这种神权在当时是具备国家机器所具备的一切权力,于是红山国君无需立法,口头就是法律,无须审判制度,他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他可以一声令下,调动千军万马去进行战争。他要干的事情,就是必须遵守的圣旨。不然,何以能够建成象

牛河梁这样规模庞大的上中下三界遗址。就以牛河梁石冢所用的石料来说,现在仅存的不下几十立方米,还有那每边长二百米的方型“城堡”墙基的几百立方米石料。这么多的石料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因为,牛河梁山岗上全是丰育的红土,不见一块石头。搬运这么多的石料则需要众多的劳动力,而那时候没有车马,完全靠人肩扛背驮。从这里就看出来统治者的强大压力。那时红山先民虽然有人身自由,但他们必须唯命是从,因为这是神的意志,是国君的命令。还有那些陶制祭器,目前收集的残片不止一汽车,要逐个复原起来也不止千件,红山先民绝不会自动贡献,显然是统治者强迫一部分人离开农业生产专门去从事陶器的制作,不用说还有那些建筑、玉雕、泥塑等等的劳役了。

从牛河梁上中下三界的建设规模来看,“红山王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实体。是等级社会制度下一个先进的文明古国。它所表现的气魄已不是氏族联盟,正如考古专家、辽宁博物馆馆长孙守道同志所说的那样:

“氏族联盟无非是社会组织”,绝没有牛河梁所表现的气魄。可见它是国家的实体。



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图

四、红山文化的文明气质

“红山王国”的强大气魄，说明了当时生产力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劳动者创造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创造了中国五千年前的古老文明。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有的用岫岩玉雕刻的玉猪龙和各种佩饰，其磨光、打孔、形制、纹饰不亚于现代水平。玉猪龙是统治阶层中的佩饰品，也是随葬品。它的出现证明了龙的原型是由猪龙演化而来的。这方面辽宁的考古专家郭大顺、孙守道写有专著，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是引人惊讶的，是玉猪龙的打孔技术竟然使用了金刚砂（可能是燧石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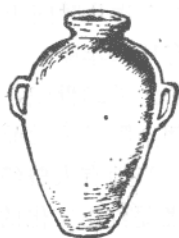
遗存中发现了纺轮。说明红山先民已由树叶兽皮为衣进入以纺织衣着的时代了。制陶工艺使用了轮制和慢轮修正技法，陶器的形制，纹饰和光洁程度比今天市售的花盆要好得多。还有泥塑艺术，它不仅把中国的雕塑史提前三千多年，而且技艺的高超也不逊于现代。例如女神庙中发现的女神泥塑残块，处处都合于人体标准。女神头像，不仅五官位置准确，而且面部微笑的表情十分生动，还用碧玉片镶上瞳孔，显得眼光炯炯有神。在喀左东山嘴发现的祭坛遗址中有所谓“东方维纳斯”的孕妇陶塑像，都是结构准确，完全合乎人体解剖学。

红山文化遗存中的建筑水平也是相当高超。例如积石冢墓基的石块不仅砌得平直，而且上下两层都是咬缝的，一如现在的砌砖规格。城堡墙基长达二百米一条，砌得相当



女神头像

直。试问如果不挂线，或会挂线而不认线是无法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再说女神庙的墙壁是编笆抹泥，在抹完第一层泥后，凿成坑（打成麻面）再抹第二层，然后再凿坑抹第三层，这种抹泥技艺现在还在应用。使人叹为奇观的是女神庙整体设计，既有长廊又有圆厅，可见当时红山先民对房屋的设计和建造，是十分讲究。至于红山先民为甚么，又怎么想得出用泥塑女神像呢？这一点尚无法说明。当然那时没有佛教，难道萨满教也是崇拜偶像的吗？



陶罐



积石冢主墓墓基



玉猪龙



大型彩陶片



筒形器



豆形镂空熏炉盖



东山嘴出土的孕妇陶塑像

从手工业技艺的发展情况来看,当时手工业已从农业游离出来(这是统治者的需要)成为作坊的手艺人。从陶器的压印纹中有人分析,多是女性指甲痕迹,女性领导着手工业生产时代潮流。也可以说人类社会大分工时,首先是男女大分工。总之,红山先民在五干多年前,就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的文明,它不逊色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可以使我们豪迈地宣称,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过去我国的史学者苦于没有地下根据,不得不把中国的文明史定为由夏朝开始,说成是四千年。现在红山文化的遗址和遗存的出现,历史可以重写矣。

五、红山文化的缺环

红山文化所创造的文明,应该为后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在辽西地区可举出的文物从时间上看,都是商周文化,中间还有1500年呢?一般说来,黄帝时代上限是公元前26世纪,至今应是4500—4600年,商朝上限是公元前17世纪,至今应是3700多年,当地有人曾经认为夏家店出土的早商青铜器是红山文化的继承,但两者相距,中断1300年。况且这里出土的早商青铜器如鼎等。其形制与纹饰(如饕餮纹)与中原出土的同代文物相一致。可以断定是从中原运到北方的。是的,辽西地区也曾出土一些青铜器,有属于当地制造的可能,但也不能补足缺环。赤峰一带也曾发现过铜矿和冶炼遗址,那只是2700年的遗址;喀左也有滴喀水铜矿,有些开采痕迹,却无冶炼遗址。至于夏家店、喀左东山嘴、小河沿文化、水泉文化等,凡是距今5000年前的遗址,都应该属于红山文化的晚期,5000年以后的遗址很难确定是红山文化的继承。总之,红山文化缺环了,红山先民和他们所创造的高度文明传到哪里去了?在哪里得到延续呢?这就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六、红山文化的走向

红山文化走向哪里,哪里是红山文化的继承文化,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上古史得以窥其端倪,从而也证明了上古史的一些著作是合乎历史的事实。

《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部落地处河北与辽西接壤,“红山王国”当然在征召之列。据史书一些记载这个历史故事梗概大致是:黄帝征蚩尤不得力,得玄女来助,玄女本身是鸟形,曾为黄帝筹划战略,但仍不能获全胜,乃有女魃自天而降,战胜蚩尤。又说女魃到处骚扰,黄帝请他回到北方去。《后汉书·张衡传》中有“夫女魃北,应龙翔”之句,从这个史实中可以看出玄女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的代表,女魃自天而降也是形容飞鸟的,而且女魃是来北方(北方当然是与华北毗邻的东北地方)东北民族都是以鸟为图腾的。魃的字音与“貂”的音相近,因此女魃就是“红山王国”的大军了。可能先由玄女(智谋之士)协助黄帝仍不能取胜,乃由玄女调集“红山王国”的大军来打蚩尤且擒而杀之。

但是,进入中原的“红山王国”大军(女魃),为了解决军需可能到处掠夺,黄帝又担心女魃反客为主,便加以罪名,说女魃到处骚扰,乃要求他回到北方去。另外把“貂”族丑化为魃,说她是旱魃,所到之处皆成旱灾,以造成舆论逼他北去。

但是,这支进入中原的红山先民其实并没有回到北方,而是流落到商丘,以后成为商的祖先。据陈子怡考证:“东北民族以肃慎族为著。在山东方面,神农氏有风沙氏、黄帝时亦有风沙氏,皆为中原所征服,按音当是一族两译名也。入山东者曰东夷,同化于内地,隔东北者永保原状。”可见红山先民确有一支留在中原,而且被同化了。留在

中原这一支红山先民在中原一带随处“流窜”。迁西、宝坻、三河一带都有他们的踪迹、北京、天津、唐山地区也可以从出土文物中看到红山文化的影子。在海河、永定河、滦河流域一带，都可摸到红山文化的脉络。他们在这里住上百十年，那里住上百十年，至尧时可能迁到商丘，并长期定居下来，以后有功乃被封在商丘。

那么，留在辽西一带的红山先民，也应继续其固有的文明以发扬光大啊！为什么也找不到继承文化呢？原来《史记·五帝本纪》另有记载，说：说黄帝打败蚩尤之后，“诸侯奉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北逐荤粥。〔集解〕：“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居于北方。”〔索隐〕：“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荤粥。”从地理关系上说，黄帝北逐的荤粥，肯定是辽西的红山先民，而不是辽西以北的黑龙江一带。由此可见，当“红山王国”以精锐之师打败蚩尤以后留在中原，而留在北方的红山先民（实力已是减弱）对黄帝称霸天下，持反对态度，被黄帝驱逐北去，于是红山文化便毁于战火之中。可是留在中原的一部分，以其先进的生产力，得以发扬光大，进而演进为商朝的文化，灭夏后而建立起强大的据有东方特色的奴隶制大国。也就是说，把原有的等级社会制度激变为奴隶社会。应该说明，商朝的奴隶制虽然具有奴隶制的模式，但更多的保留着等级社会制的原有形态，土地仍然国有，奴隶仍然是全国平民，只是统治者对平民的压榨更为残酷，甚至危及人身自由，可以杀戮、买卖、殉葬等等。

关于商的祖先来自东北之说，过去史学界有过多次探索。我这里引用孟宪仁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上发表的“日本史前文化与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渊源”一文中所举出的几例：

（1）1933年，傅斯年在《东北史纲》

一书中说：殷人自东北入中原。

（2）陈子怡撰写的《中华民族的女系时代》一文也极力主张商人是从东北去的。

（3）徐中舒所撰《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也有类似主张。

（4）陈梦家的《佳夷考》：玄鸟降生之故事，行于东北民族。刘节的《诗经中古史资料考释》中说：“中国民族最早的唯有貉貉族”，殷人也是从古代的貉貉族出来的”。

（5）近代张博泉也采纳了“殷商发祥东北”说。

但是这些主张，不能为时人所公认，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地下出土文物证据。今天，辽西红山文化遗址的被发现，可以证明上述诸人的推论。更由于史书上有关记载，证明了商人来自东北。

在商之前，历史上有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几个朝代。而商朝的祖先契（音谢），说是帝喾的儿子，是帝喾次妃，简狄（有娥氏之女）所生，传简狄与宗妃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生契。《史记·殷本纪第三》〔索隐〕：“樵周云：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又：《卜辞》中证明“商朝认帝喾为高祖，（请注意“认”字）祭祀非常隆重”（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根据史书记载，禹与以前各帝都是黄帝后裔，那个时代都是父传子属，所谓禅让制度，无非是在同族中的选贤任能。至夏禹本想传于贤者皋陶（音尧）氏（东夷族）、其子启又夺而有之。可见黄帝以下，都是贵族世袭制。但是，商祖契则不是黄帝的后裔，契的父亲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所以契认喾为祖先。史书上为了维护世袭贵族的统治，故意把契说成是帝喾的儿子。可是史学家已确认契是认帝喾为祖的。那么契为什么认喾为祖呢？无非是契为了光大门楣，跻入贵族行列以掩饰其出身寒微。但是契确系简狄所

生。简狄食鸟卵而生契，简狄是以鸟为图腾的有娥氏的女子。可以推定简狄是流落中原的红山先民后代。又说简狄是帝喾的次妃，懂得天文学，史谓简狄“生十日”，即简狄创造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有人考证天文学的创建也是始于东北。说明简狄继承了红山文化时期的巫术知识（神学），在中原得到发展。象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帝喾破格录用，列为嫔妃贵族之列。由此可见简狄不一定是帝喾妻子，契也不是喾之亲子。

红山先民被封在商丘以后，以其原有的高度文明，为上古各个时期做出许多贡献。契在尧舜时做司徒（即所谓舜举八元）掌教化百姓（百工）之事，协助禹治过水，其后代还有许多发明家，如伯益凿井、番禺以竹为舟、吉光以木为车、王亥发明牛车、相土发明马车等等，都体现了红山先民原有手工业优势得到继承和发扬，而且善于作买卖，至今买卖人仍称为“商人”。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力远远超过了夏的经济实力，一举灭夏而建立商朝。

以上所述各点，都是以图腾为轴线得出商自东北的结论。辽西牛河梁女庙中，发现一只陶鹰的残足，据测算这只陶鹰身高可在80厘米左右。说明红山先民也是以鸟为图腾的。图腾在先民的心中是有着重要的地位，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他们自己的旗帜。除图腾考证之外。更能说明殷商文化是红山文化延续的根据，乃是在红山文化圈里所发现的大量的殷商文化的青铜器。

这里摘录一段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馆长刘新民同志在《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上发表的“大凌河谷在上古时期就是东北去中原的通道”一文中叙述：

“1955年以来，在凌河两岸，先后出土

37批计70件商周的青铜礼器，有的出自窖藏，有的出自墓藏。1973年3月和5月，在大凌河东岸北洞村出土的两批窖藏青铜器，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两个窖坑在孤山脚下一个笔架山的顶部，两坑相距3.5米，埋藏的器物排列有序，重器在前，面向孤山。出土之后，曾请教过郭沫若和唐兰同志，他们都认为两个窖藏都同祭祀活动有关。很可能是诸侯祭山川，而埋藏的。”

在辽西发现殷商和西周的遗址有270多处。前文说过，红山文化范围内并没有铸铜遗址，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的又是一样，可见都是从中原远道搬运而来的。为什么商朝对这一地区注入这么多兴趣呢？而且在众多的青铜器中除少数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外，大多数是祭祀用品呢？只能象郭沫若和唐兰所说明的那样，商朝在这里有着很广泛的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绝非祭天、祭山，因为商代已是统带中原的大国，祭天祭山何须专程到辽西来呢？结论只能是一个，是商领天下之后，不忘故土，频繁地到辽西一带来祭祖。他们沿着大凌河古道，用牛车马车载着他们祭器，洋洋而来，祭祀他们的远祖，而且是争相归来，（如满族人入关后到盛京祭祖，美洲黑人到非洲寻根一样）以致辽西各地都发现了商朝以及西周的青铜器（说明西周时商的遗民也是来祭祖的）。虽然商距红山文化已逾千年，而古人“朝圣”的心情是无法泯灭的。

红山文化的走向就是如此。

红山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文明一点论，使人们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大国，各个地区都有个自民族的文明史。

红山文化，可使中华民族豪迈地宣布：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的祖先为人类的进步开拓出光明。

从沈阳塔湾舍利塔石函铭文 看辽代沈州的居民

朱子方

沈阳是一座历史名城，远在七千多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居住、活动、生息繁衍，并且已经创造了相当高的文化，新乐遗址出土的遗物，就是那个时期的创造。此后，历经殷周以至春秋、战国、秦汉，这里居住的人更多，有“东夷”族系的人，也有汉族人，而且还出现了各族聚居的城镇，在今沈阳市区和郊区发现了许多星罗棋布的春秋战国墓葬和汉代墓葬，而汉代的尤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确实记录。据考古学家推断，汉代候城县的县治，可能就在沈阳老城。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沈阳故宫十王亭院内，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址，最下层为战国遗物，其上为秦汉遗物，再上分别为辽、金、元、明时期的遗物，这种层次明确的叠压关系，清楚地表明了历代建置的序列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公元921年（辽太祖神册六年），辽朝在这块历代的遗址上建置了沈州，下设两个县，一个叫三河（后改名乐郊）县，一个名渔阳（后改名灵源）县，居民是从蓟州（今河北蓟县）三河等县俘虏来的汉人。但从蓟迁徙来多少汉人？原来在沈州居住的是些什么人？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因而都是未知数。

1985年，沈阳市考古工作者在铁西区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中发现石函一件，石函上盖和函身四面都刻有汉字铭文，共五千余字，大都是施财修建此舍利塔者的题名，这就为我们了解辽代沈州居民情况提供了可贵的一斑。

现在，先把石函铭文的两段主要内容，略加诠释，而后再分析题名人的情况。

石函上盖顶面中部刻的是建造舍利塔的地点及时间，文云：

维南赡部洲，大契丹国辽东沈州西北丰稔村东，重熙十三年岁次甲申，四月大，壬辰朔，蓂生十五叶，葬 佛舍利一千五百四十六课记。

南赡部洲，《佛经》中所说的四大洲之一，在顺弥山南咸海里，见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一。大概佛教信徒认为契丹国隶属南赡部洲，故把它写在前面。重熙十三年，为公元1044年，蓂，草名，相传为瑞草，随月生死，每月上半月，日生一叶，十五日而后，日落一叶，至三十日落完。如月为小尽，则留一叶奄奄不落，反青而为下月初一第一叶。古人用这种蓂叶的生落纪时，称为蓂荚历。辽人也常用这种记时法。所谓“四月大壬辰朔蓂生十五叶”就说明四月是大尽，壬辰是初一，葬佛舍利这一天，是四月十五日。课，是颗的代用字。

函身前面刻的是建塔人的祝愿以及筹建人、主持人和请到的功德主、塔院主等。原文是奉为太后、皇帝、皇后、太后万岁，诸王、公主千秋，文武百僚恒居禄位，州尊太师福寿延长，风调雨顺，国泰人安，万民乐业。邑人李弘遂等百余人见武家庄东堞上，地维爽凯，平坦如镜，以此，众邑人请到前僧政沙门云秀为功德主，转请到僧法直为塔院主，共同发愿造无垢净光舍利佛塔一所。如有信心，请挂芳号。

在封建社会，黎民百姓如果有什么祷告和祝愿，首先要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太后、皇帝、皇后及其皇族祝福，其次为各级官吏祝福，最后才是为人民群众祝福。这类铭文，在辽代石刻中常见。惟这段文字两书太后，则不易理解。此铭刻于重熙十三年，其时兴宗之母钦哀皇太后尚在世，第一个太后，理应指钦哀，而第二个太后指谁呢？考《辽史后妃传》，圣宗耶律隆绪有两个皇后：一个叫仁德皇后，小子菩萨哥，史称“美而才”，选入掖庭以后，封为齐天皇后。然她生二子皆早卒。宫人耨斤（即钦哀）生兴宗，齐天养为子。及圣宗死，钦哀自立为皇太后，“摄政”令人害死齐天。建此塔时，齐天已死十三年，不应在铭文中再为她祝福。但此外又没有第三个皇太后，颇疑这两个太后中，有一个指齐天。因为齐天甚有贤德，是一个受中原封建礼教陶冶的贤后良母，兴宗虽不是她亲生，但兴宗对她甚为恭谨，这就引起了钦哀的不满，所以必欲杀之而后快，特制造了一件北府宰相肖湜卜（齐天弟）等“谋逆”的冤案，把齐天等一千人等一齐杀掉。据传说，齐天被害的那天，“有见后于木叶山阴者，乘青盖车，卫从甚严”。木叶山是契丹族的圣山，可见群众认为她是升天去了。由于她的冤死，所以民间还这样的纪念她、祝福她。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能否成立，尚有待读者评议。邑人，是佛教信徒为修功德（如修塔建寺、立经幢、印佛经及设斋供养等）而组织的邑社中人。邑社的名称有多种，如千人邑、太子诞圣邑、念佛邑、弥陀邑等，是佛教信徒自行结合的宗教社团。此处只称邑人，而未记邑名。由末句“如有信心，请挂芳号”来看，是自愿参加的。原来发起人只有李弘遂等一百余人，而在石函上题名的竟有数百人，可见后来陆续施财自报“芳号”参加的人很多。

这两段文字是石函铭文的主要内容，其余都是题名，也就是施财参加建塔的各界人士名单。石函拓片未全发表，仅就已发表的三幅拓片统计，题名者329人，有个49姓，现在表列如次：

姓氏	李	张	刘	王	高	康	杨	武	赵	元	齐	金	孙	文	董	陈	贾	魏	傅	田	都	马	段	严	穆	韩	
口数	58	49	24	20	13	13	10	10	9	8	7	6	5	5	4	4	4	4	4	3	3	3	3	3	3	2	
其中	男	36	33	9	10	12	9	3	7	7	8	6	5	1	5	3	1	1	2	2	1	3	1	1	2	3	0
	女	22	16	15	10	1	4	7	3	2	0	1	1	4	0	1	3	3	2	2	2	0	2	2	1	0	2
	官	2	4	4	3	0	5	1	0	1	1	2	1	0	0	0	0	1	0	2	0	0	0	0	0	0	
	民	56	45	20	17	13	8	9	10	8	7	5	5	5	5	4	4	3	4	2	3	3	3	3	3	3	2
姓名	崔	郝	卢	史	郭	吴	谢	师	寇	柳	乎	墨	霍	伊	闾	柴	褚	归	奎	达	遏	耶律	曷鲁	僧尼	姓氏不明	总计	
口数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6	10	329	
其中	男	1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1	15	1	194	
	女	1	2	2	1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1	9	135	
	官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28	
	民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16	10	301	

此表须说明三点：第一，凡是拓片模糊不清、辨别不出姓名的，一概未统计。

第二，妇女凡称××氏者，皆按二人统计。如武魏氏，武为其夫姓，魏为本人之姓，题名虽是一个，实代表两人两姓，为了能够较多反映当时沈州各姓居民的人口数，所以作了这样统计。

第三，每一姓的人，虽然同姓，但在当时，由于阶级地位不同，贫富悬殊，在社会上分散为许多远近亲疏、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的家庭或宗族。今为叙述方便，一姓皆作为一个家族，不再细分。

从此表所反映的48姓来看，绝大多数是汉族，契丹族只有二人，另有四人的族属尚待研究不敢肯定。

李氏共58口，是最大的一个家族。其中有两个做官的，一个叫李尧永，官“昭德军节度副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殿中中侍御史，云骑尉”。昭德军是沈州的军号，节度副使是沈州军政长官第二把手，地位仅次于节度使。辽代的南面官制，主要沿袭自唐，一个人的官衔很复杂，有职事官、散官，有勋，有爵，有食邑，等等，而品阶还不一致。以李尧永的官衔为例，略加分析。昭德军节度副使是职事官，掌管一州军政；银青崇禄大夫为文散官；检校左散骑常侍为职事官，侍从皇帝左右，掌讽谏；殿中侍御史，职事官，掌殿廷供奉之仪式；云骑尉为勋，《辽史·百官志》残缺，未记官阶品秩。如按照唐朝制度，他最高的品阶为从三品，最低的品阶则为从七品下。一个叫李匡受，官“指挥使”，是一个军官，但不知是什么军的指挥使。辽以武立国，任指挥使者很多，如“节度使取名总目”中，就有某马军指挥使司，某步军指挥使司，其下都有指挥使、副指挥使，品阶可能不太高。另外，还有一个都维那李弘遂。都维那不是官，而是佛教寺院中管理僧众庶务的僧人。这座舍利塔的修建，李弘遂是主要发起人之一，以他领衔，说明他在沈州佛教界有相当的地位。不仅如此，李家还是拥有土地的地主，为建塔而捐施土地的“施院地主”就有李匡顺、李匡友和董斌序妻李氏三人。由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李氏这个大家族在沈州的势力是相当雄厚的。

张氏共44口，也是一个大族。其中有五个做官的：一个叫张宁，官“军衔巡官”，这个官名不见于《辽史百官志》，可能是军事机关衙门（如节度使司等）的巡查官，职位不高。一个叫张昌胤，官“兵马都知”。此官亦不见于《百官志》，疑为兵马都总管的俗称或省称。一个叫张维德，官“成州都孔目官，登仕郎，试太子正字，武骑尉”。辽成州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村。都孔目官为职事官，掌管州的文书档案，稽核文簿。试太子正字，试为试用或初用的意思，太子正字是东宫的职事官，掌典校书籍（唐制从九品上）。登仕郎为文散官（唐制正九品下）。武骑尉为勋（唐制视从七品）。一个叫张继全，官“随驾步军什将”。古代军队以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什将当为管十人的军官，相当我们现在部队的班长。《辽史·兵卫志》亦作十将。契丹兵制：“凡举兵，……乃诏诸道征兵……（诸道）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械”。这个十将，即什将。什为军队编制的最小单位，什将，则是军队中的最低军官。“随驾步军什将”，《百官志》不载，足补史缺。

刘氏共24口，其中有四人做官。一个叫刘□遂，官“节度教练”，当是节度使司衙署的教官，可能也称教练使，如□奉殷曾任左教练使（见□奉殷墓志）。一个叫刘翌，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检校官，始于唐朝，最初是皇帝下诏特